

冷戰時代的台灣文學外譯

——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的運作（1952-1962）*

王梅香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美國權力如何介入台灣文學的外譯工作。透過美國國家檔案局的檔案（NARA），試圖說明在文化冷戰下的台灣，美國新聞處透過譯書計畫（Book Translation Program）、「中國報告計畫」（China Reporting Program）和「台灣報告計畫」（Taiwan Reporting Program），將台灣文學推介到西方世界。本文將戰後台灣文學的外譯置入文化冷戰的背景，認為這些工作主要是為了與共產中國的文化宣傳對抗，並且是為了支持自由中國的文化正統而展開。首先，美新處透過調查台灣出版市場，釐清並定位台灣為東亞主要的中文閱讀市場之一，致力於發展內部出版和對外推介台灣文學。其次，美新處尋求在地文學社群、出版社的合作，籌劃Heritage Press系列叢書，使得台灣文學首次有系統地被介紹到國外。這些戰後台灣「新」（new）世代作家的創作，有些就是其初登文壇之作，而就因此以英文的面貌進入東南亞，甚至登上世界的舞台。本研究最終認為，並非諸如美新處長「喜愛文學」等個人因素，而是「譯書計畫」決定了台灣文學的外譯，因此應該將台灣文學外譯的時間點提前到1950年代。同時，美新處的外譯叢書中，所展現的中國性（台灣

* 本論文曾宣讀於2013年11月22-23日，由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文藻外語大學承辦之「台灣文學外譯學術研討會」。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本文懇切的修改意見，謹此表達由衷的感謝。

性)、現代性、反共性與人性，其實服膺了當時美國與自由中國的政治目標，呈現台灣文學外譯中的政治因素，並與文化冷戰直接關連。

關鍵詞：文化冷戰、中國報告計畫、台灣報告計畫、Heritage Press、
現代主義文學、麥加錫



Translating Taiwan Literatur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in the Cold War Era:

The Operation of USIS Book Translation Program (1952-1962)

Wang Mei-Hsiang

Ph D. Candid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how the U.S. Power to intervene in the translation of Taiwan literatur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By checking the archives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the paper argues that USIS introduced Taiwan literature into the Western world through the Book Translation Program, China Reporting Program and Taiwan Reporting Progra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se programs mainly played the role of cultural propaganda against communist China and supported the cultural orthodoxy of free China. First, USIS made a survey of publishing markets to clarify that Taiwan was one of the main reading markets in East Asia, and endeavored to develop internal publication and external promotion of Taiwan literature. Second, USIS cooperated with local literary communities, planned the series of Heritage Press, and made Taiwan literature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o foreign markets. The postwar Taiwan “new” generation writers, some of them made their debut on the literary scene, had their work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circulated in Southeast Asia, or even took a step onto the world stage.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it is the Book Translation Program that had made a turning point of the translation of Taiwan literature, rather than the USIS PAO’s personal factors of loving literature. Therefore, the time frame of translation of Taiwan literature should retrospect to the 1950s. Meanwhi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ries of Heritage Press revealing Chineseness (Taiwan-

eseness), Moderity, Anticommunist, and human nature adhere to the political go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ee China and show the political factors of Taiwan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ir direct link with the Cultural Cold War.

Keywords: Cultural Cold War, China Reporting Program, Taiwan Reporting Program, Heritage Press, Modernist Literature, Richard M. McCarthy



冷戰時代的台灣文學外譯

——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的運作（1952-1962）

一、前言

目前學界討論台灣文學外譯的歷史，通常以1970年代齊邦媛推動《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台灣1949-1979》¹（*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英譯作為討論的起點，例如齊邦媛²、彭瑞金³、譚光磊⁴等人的文章。1967年，齊邦媛因為傅爾布萊特交換計畫（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赴美進修，注意到在英文的文學中，要看中國文學時，只有古典的作品，近代作品付之闕如。後來，齊邦媛受國立編譯館館長王天民的邀請，希望她能為國家做一些文學推廣的工作。齊邦媛自述：「台灣在那個時代是華人地區最自由的，有很好的文學作品，應該好好推廣，要讓外國人知道我們不是在這裡只逃難的。」⁵於是，開啟她和國立編譯館的合作關係。與此同時，齊邦媛和《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也保持合作關係，齊邦媛提供譯稿給筆會，後來還曾經在1992年擔任筆會季刊主編，繼續為台灣文學外譯的工作而努力。然而，本文透過對於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簡稱USIS，以下行文使用「美新處」）譯書計畫以及Heritage Press

1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厚達一千多頁，1975年由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出版社（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單德興，〈齊邦媛教授訪談：翻譯面面觀〉，《翻譯論叢》5卷1期（2012.03），頁255。

2 齊邦媛，〈中書外譯的回顧與檢討〉，《文訊別冊》151期（1998.05），頁22-24。齊邦媛，〈台灣文學作品的外譯〉，《精滄》28期（1996.05），頁38-40。

3 彭瑞金：「過去《笠》、台灣筆會、《文學台灣》等民間文學團體，嘗試以民間的力量，推動台灣文學的外譯和國際交流……」，這幾個民間團體的活動最早也是從1970年代開始，和本文所主張的台灣文學外譯史應該提早到1950年代的美新處譯書計畫不同。彭瑞金，〈台灣文學亟需台灣觀點的外譯計畫〉，《文訊》274期（2008.08），頁48-51。

4 譚光磊：「台灣文學的外譯工作，從1972年殷張蘭熙女士創辦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The Chinese PEN*）、齊邦媛教授編著《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台灣1949-1979》，到王德威教授主持的哥倫比亞大學一系列中書外譯，三十年來已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譚光磊，〈台灣文學外譯與大眾出版〉，《台灣文學館通訊》32期（2011.09），頁37-43。

5 單德興，〈齊邦媛教授訪談：翻譯面面觀〉，《翻譯論叢》5卷1期，頁255。

叢書的了解，試圖思考「台灣文學外譯史」新的可能性，亦即我認為應該將「台灣文學外譯」的時間點提前到1950年代。透過本研究，我最終要討論的是：美新處的譯書計畫在台灣文學外譯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美新處之前，國民黨在抗戰初期的國際宣傳中，便提到「文學」作為宣傳部門之一。⁶ 後來隨著戰火蔓延、軍隊遷徙，宣傳品以雜誌和報紙為主，及至戰後，「為加強對國際宣傳，中央文物供應社、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等還出版了一批英文書籍對外發行。」除《國事叢書》外，這類書還包括《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實業計畫》、《中國之命運》等。⁷ 根據目前所見資料，這些書籍和文學的相關性不高，以政治宣傳為主，但仍有作家關心「在台灣的中國文學作品外譯」的事，例如引文中提到的陳紀滢：

翻譯像「紅樓夢」這樣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當然不是件容易事，也不是普通「英文不錯」的人就敢於嘗試的。記得中英文修養都極高的林語堂博士曾企圖譯「紅樓夢」，可是嘗試之後終於放棄原來計劃，而另寫了一部「瞬息京華」。近年來，陳紀滢先生頗關心中國文學作品的介紹到外國的事，他也為了這件事同負責「文教」的官方當局談過，大概並沒有具體結果。即令是「譯」，則在選翻譯者時，恐怕也是件頗不易的事呢！⁸

如果國民黨的外譯工作與政治宣傳受到的關注不多，那麼，美新處在台灣的譯書計畫受到的關注也同樣地稀少。在單德興的文章〈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之前，大概只有翻譯學界李惠珍⁹、賴慈芸¹⁰和周文萍¹¹的學位論文，觸及美新處或是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譯

6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03），頁176-178。

7 辛廣偉，《台灣出版史》（中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08），頁38。

8 禾辛，〈「紅樓夢」英譯本〉，《聯合報》，1958.06.04，6版。

9 李惠珍，〈美國小說在台灣的翻譯史（1949-1979）〉（台北：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10 賴慈芸，〈飄洋過海的謬思：美國詩作在台灣的翻譯史（1945-1992）〉（台北：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11 周文萍，〈美國戲劇在台灣（1949-1994）〉（台北：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書，對於美新處翻譯美國文學有所提及，然而，他們關注的焦點均在美新處如何將美國文學翻譯成中文（英翻中），而非台灣的文學作品如何翻譯成英文（中翻英）。至於將台灣文學（或是以當時的說法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翻譯成中文，在文學界有若干的看法。例如何凡（1970年）在〈文藝也該輸出〉一文中提到：

說到現代中國作家作品譯成英文出版，只有台北美新處在參加第做處長的時候，因為他本人喜歡文藝（底線為筆者所加），並且認為把當代中國作品介紹給美國人，也是增進中美國民了解與友誼之一道，約於一九六二——四年間翻譯了短篇小說、詩與散文十餘冊，用香港的出版社名義出版。當時負責翻譯的有吳魯芹、余光中、殷張蘭熙、聶華苓、黃瓊玖、王德箴諸君。這些書美國人看了，據說反應不錯，在東南亞等通英文國家也有銷售，當地人看了對自由中國作家也有良好印象。可惜這件事在美新處易主之後即告中止，工作不能延續，自然無法見功效了。¹²

何凡對於「現代中國作家作品」翻譯成英文，歸功於當時台北美新處處長麥加錫，¹³ 因為麥加錫喜歡文藝，而希望將當代中國作品介紹給美國人。何凡認為這也是一種文化外交，增進中美兩國的互相理解。根據何凡的意見，可以將台灣文學外譯的時間點提前到1960年代，並且將文學外譯歸因於個人因素，因為個別美新處處長的喜好而促成。及至1998年，《中國時報》記者傅建中也肯定麥加錫處長為「台灣文藝復興的守護神」：

在五〇和六〇年代，台灣在國際間被譏為文化沙漠時，美國新聞處確實做了不少事，對帶動台灣文學藝術的發展，有相當的貢獻。特別是麥嘉

12 何凡，〈文藝也該輸出（下）〉，《聯合報》，1970.04.07，9版。

13 在本文中，不同引文將Richard M. McCarthy翻譯成不同的中文名，例如麥加第、麥嘉錫和麥加錫，為了保持原作者的用法，本文在引文中不予更改，但其實所指為同一人，特此說明。

錫 (Richard M. McCarthy) 擔任處長的那幾年。麥氏本人出身於愛荷華大學，和已故詩人保羅·安格有種介乎師友的關係，（安格後娶聶華苓為妻，是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室創辦人）故對台灣文藝發展興趣特濃。著名詩人余光中，已故美國文學專家朱立民、畫家席德進、小說家白先勇、陳若曦等，都曾受惠於麥氏，白、陳二人甚至可以說是麥氏發掘的。那時散文大家吳魯芹（已故）是麥的高級顧問，對麥氏成為台灣「文藝復興」的守護神，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¹⁴

根據上述看法，台灣文學的外譯乃是由於麥加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因為他「個人」對於文學的愛好、對於作家的拔擢，讓戰後台灣的文學作品得以英譯，並登上世界的舞台。但是，僅歸因於個人的喜好，並不能完全理解整個美新處翻譯台灣文學作品的淵源。其實，在麥加錫來台任職美新處處長之前，台灣的譯書計畫已經於1952年展開。¹⁵

國內歷史或傳播學者多從「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hip)的角度來理解美新處在台灣的文化宣傳。但我認為從該角度看待台灣文學的外譯，可能產生的侷限是：所謂的文化交流、文化外交，其實是美國政府、美國新聞總署的對外宣稱，事實上，在當時自由中國與美國的文化交流並不對等，¹⁶因此，採取該視角只是「同意」了美方的立場。而「公共外交」一詞產生於1965年，由美國學者Edmund Gullion提出，在本文討論的時間範圍（1952-1962年）之後，而且提出該詞彙的時代背景是冷戰時期，是否有為美國權力粉飾或緩頰之嫌值得商榷，而且，從該角度來談論美國權力，只能看到權力的「表象」，而非「實質」關係。其次，從文化交流、公共關係的角度來討論，書籍的「內容」並不重要，由於出版的週期較長，書籍通常沒有被廣泛地看作公共關係的工具，但它們確然能夠成為公共關

14 傅建中，〈USIA與台灣的文化發展〉，《中國時報》，1998.10.24，13版。

15 本文討論的時間起訖點為1952-1962年，1952年為台灣譯書計畫的開始，1962年為Heritage Press系列的結束，也是麥加錫任職台北美新處任期的結束，故以這十年作為觀察的對象。

16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1951-1970）〉，《歐美研究》31卷1期（2001.03），頁79-127。

係的工具之一。基於目前對於台灣文學外譯這個課題的討論，不是歸諸於個人因素，就是僅談論公共關係的策略，都沒有全面釐清美新處的譯書計畫和台灣文學的關係。因此，本文將嘗試憑藉美國官方檔案的紀錄，對此展開討論。

二、台北美新處的譯書計畫

冷戰時代開啟了美國、蘇聯的對立，也開始自由中國與共產中國各方面的競賽。他們競爭的不是土地和資源，而是爭取其他國家對於自身的認同，那麼，認同要如何爭取？要透過什麼方式才能攫取對方的心智？在自由中國內，國民黨使用巡迴宣傳箱、反共抗俄宣傳列車與巡迴文化工作隊進行島內的宣傳，¹⁷然而冷戰雙方所要競爭的對象不是在一個特定的空間內，而是跨越國界範圍。因此，藉由共同的、可辨識的語言（如中文、英文），透過書寫，可以突破空間的藩籬；透過書寫，可以拓展意識形態的疆界；透過書寫，可以開展人際互動的邊陲，譯書計畫便在這樣的宣傳背景下誕生。

1952年，台北美新處譯書計畫正式展開。這個時間點的重要性在於，在1958年麥加錫來台之前，其實台北的譯書計畫已經運作多年，歷任的處長也會進行譯書工作。例如：在麥加錫之前的美新處處長鮑威爾（Ralph Powell），在譯書計畫上也有相當的作為，只是未曾被提及而已。因此，我們不適合僅從「個人」愛好文藝的角度去思考譯書計畫，因為譯書計畫本身就是美新處例行的工作。當美新處譯書計畫進入台灣，當時戰後台灣的印刷事業才開始起步。1945年之後，台灣的翻譯事業呈現鬆弛和落後，極少有創作和譯者出現。¹⁸1949年國府來台，出版商和作家亦隨之來台開始發展，一開始的幾年內，出版擴展快速，教科書是此時期的大宗（mainstay），此外，還有中國經典和中國大陸時期的一般作品重印。根據美方的調查報告（1959年），當時在台灣的31個主要的出版社，在1958年一共有2,463本書出版，總共印了

17 林果顯，〈一九五〇年代反攻大陸宣傳體制的形成〉（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頁93。

18 許壽裳，〈臺省編譯事業的拓荒工作〉，黃英哲編，《許壽裳台灣時代文集》（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11），頁204。

9,248,970冊，換句話說，每一本書約印了3,755冊。然而，在這2,463本書中，有1,115本教科書（而且很多教科書都是重印），其次是中國經典（Chinese classics）。而以翻譯的作品來說，文學類是佔最多的。¹⁹ 從翻印舊書和只印教科書兩個現象，可以看出當時台灣出版界缺乏活力，業者抱著保守的心態，只做「穩賺不賠」的生意，而美新處的譯書計畫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進入台灣。

誠如上述，在1950年代台灣文學外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美國人開啟了這個可能。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陳紀滢的《荻村傳》可以說開啟台灣文學外譯之先聲，但台灣文學真正「有計劃」的外譯應該在稍後要討論的 Heritage Press 系列中完成。《荻村傳》這本小說是陳紀滢應《自由中國》創辦人雷震的邀請而作，於1950年底在《自由中國》上連載完畢。1951年4月，《荻村傳》中文版出版，同年年底，有一位讀者陳來思（日治時期的筆名是藤晴光）將《荻村傳》譯成日文，欲徵求陳紀滢同意於日本「大日本出版社」出版，後來陳紀滢因該出版社資歷甚淺，而將日文出版計畫擱置。1953年，台大英文系主任英千里受美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駐台代表饒大衛（David Nelson Rowe）委託，翻譯該書。每翻完一章，就交由趙麗蓮女士所辦的《學生英文文摘》（*The Student's English Digest*）發表，但最後並沒有出書。1956年，當時尚未來台的麥加錫（時任泰國曼谷美新處處長），委託其副處長司馬笑（John Bottorff）來台協商，希望出版該書。²⁰ 該書後來透過香港美新處的「中國報導計畫」（China Reporting Program），於1959年9月在香港由虹霓出版社（The Rainbow Press）²¹ 出版了《荻村傳》（*Fool in the Reeds*）英譯本（由張愛玲翻譯）。這是目前所見台灣文學外譯的開始，而這個

19 A Report of Book Publishing in Taiwan, May 28, 1959, Taiwan Taipei 1959-1960, Box9, P61, RG306, NARA.

20 陳紀滢，〈「荻村傳」英、日文版出版經過〉，《聯合報》，1974.11.18，12版。

21 關於香港的虹霓出版社（The Rainbow Press），是由黎劍虹女士在1954年所創立，專門負責出版香港美新處的書籍，這也是黎劍虹從中國南遷香港之後，為了謀生而踏入出版業的開始。（黎劍虹是國民黨內「文壇三傑」之一梁寒操的妻子，梁寒操在國民黨內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而黎劍虹更是宋美齡的好友兼秘書，易言之，黎劍虹和國民黨的關係相當密切。）梁黎劍虹，《梁寒操與我》（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0.08），頁152。

開始是透過香港美新處的譯書計畫所促成。也就是說，透過美新處出版的第一本台灣文學作品並不是在台北美新處的「譯書計畫」內完成，反而是在香港美新處的「中國報告計畫」下實現。

我們透過語言和內容的分類，可以簡要地看出譯書計畫在台灣的發展狀況。如果根據翻譯時所使用的語言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英翻中，二是中翻英。然而不管是英翻中或是中翻英，都是源於與共產中國文化宣傳對抗下的結果。其中，美新處譯書計畫從「英翻中」開始，也是1950年代前期的主流。關於英翻中的需求（包括當地作家以中文書寫的作品）²²，主要來自於爭取自由中國、共產中國之外的「海外中國人」（Overseas Chinese）的認同，希望其透過閱讀中文（華文）的作品，凝聚自由世界的靈魂，成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根據美新處的統計，海外華人的數量高達一千三百萬人，比當時台灣的人口多出三百萬，²³這是一個不容小覷的群體。因此，爭奪海外華人的心靈和意識（soul and mind），成為兩個中國競爭的對象。那要如何爭取這一群人加入己方陣營？其實書籍並非當時被認為最好的方式，甚至在宣傳上被視為「慢速媒介」（Slow Media），但它仍是宣傳的主要方式之一，而且書籍具有的優點是：它不受傳播工具（例如需要特定器材播放）、傳播人員、傳播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此外，當冷戰雙方其中有一方，透過書籍開始對東南亞進行意識型態的宣傳，另一方自然無法置身事外。

誠如上述，「英翻中」的書籍主要針對東南亞的華人進行宣傳；至於「中

22 在美新處出版的中文作品中，有些是英翻中，有些是中文書，由當地作家直接以中文書寫然後出版（locally written），因為最後成品均是以中文呈現，而且，均是針對海外華人所出版，因此，不論英翻中或是中文書，在此一併歸入中文書討論。以後者而言，例如：姜貴的《旋風》一書，便是由美新處贊助出版，然後在對此書感興趣的地區（如東南亞）銷售。Operations Memorandum, USIS Taipei to USIS Bangkok, Hongkong, Kuala Lumpur, Manila, Phnom Penh, Rangoon, Saigon, Seoul, Singapore, Vientiane, USIA: IAF, ICS, "Indigenous Authors: Chinese Novel: The Whirlwind", April 30, 1959, Taiwan Taipei 1959-1960, Box9, P61, RG306, NARA. 根據美新處的統計，姜貴的《旋風》一書的銷售情形良好，印了10,000本，在5000本由美新處買走之後，主要用來分送各地美新處；4335本透過商業管道銷售出去，剩餘庫存665本。該書的銷售狀況與1958-1959年的其他書籍相比，其銷售量僅次於林語堂的*Secret Name*一書。Foreign Service Despatch, USIS Taipei to USIA, "Book Publishing in Taiwan", February 8, 1960, Taiwan Taipei 1959-1960, Box9, P61, RG306, NARA.

23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 USIS Taipei to USIA, "Book Publishing in Taiwan", May 28, 1959, Taiwan Taipei 1959-1960, Box9, P61, RG306, NARA.

翻英」，也是源自於雙方的宣傳／反宣傳競爭，主要針對對象是海外能夠閱讀英文的讀者。1949年共產中國建立之後，進行對於中文書的「外譯」工作，尤其是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翻譯，無論在歐美或是亞洲，都較中國近現代文學來得令人重視。²⁴大量的中國文學外譯，引起自由中國美新處的焦慮和恐慌。簡要回顧1950年代共產中國的宣傳品，可以觀察北京外文出版社²⁵（1951年迄今）的外譯書籍。《阿Q正傳》（魯迅，1953）、《中國小說史略》（魯迅，1959）、《論藝術與文學》（毛澤東，1960）、《唐代傳奇》（白行簡，1962）等。共產中國有計劃地將國內作家的作品譯成外語，提供給東南亞以及其他地區從事文化宣傳。相較於共產中國的積極外譯（中翻英），早期美新處的譯書一直以「英翻中」為主，直到意識到對方的宣傳威脅時才有後續反應。

直到1958年，在麥加錫正式來台任職前的代理處長莫澈理（James Mocerri）認為，有鑑於共產中國在人文和科學生產著作的英文版目錄（bibliography），自由中國在著作「外譯」（中翻英）的部份也應該扮演領導的角色。²⁶所以，同年10月，台北美新處已經對此開會討論，並擬出1959-1961年的工作時程表。然而，莫澈理的計畫，顯然是針對自由中國從1956-1958年出版狀況做出「英文版」的目錄，他會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共產中國已經在海外大張旗鼓地從事宣傳，利用中國人文和科學英譯，影響西方學界對於中國人文和科學成就的理解和判斷，換句話說，台灣圖書目錄的外譯亦是源自於與共產中國的對抗。及至1958年麥加錫來到台灣之後，進行台灣報告計畫，便是為了向世界介紹台灣，而其中的方式之一，便是透過「中翻英」文學作品進行宣傳。本文所探討的Heritage Press系列叢書就是在此脈絡下產生。

如果根據譯書計畫翻譯的「內容」進行分類，目前所見美新處在台灣的

24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文化聯絡局編，《中國對外文化交流概覽（1949-1991）》（中國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2），頁323-324。

25 外文出版社，亦稱外文圖書出版社，1951年成立，1963年改稱外文圖書出版社，由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簡稱外文局）領導，原是國務院一個直屬局，負責負責協調管理中國外文圖書出版發行工作的專門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文化聯絡局編，《中國對外文化交流概覽（1949-1991）》，頁511。

26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 Taipei American Embassy to USIA, "Proposed bibliography of public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22, 1959, Taiwan Taipei 1959-1960, Box9, P61, RG306, NARA.

譯書計畫，可以約略區分為下面三類：「主題計畫」（Subject Program），例如《化學創造新世界》（*Chemistry Creates A New World*）²⁷、《美國鄉村生活》（*American Farm Life*）²⁸、《美國繪畫簡史》（*Pocket History of American Painting*）²⁹、《美國宗教指引》（*Guide to Religious of America*）³⁰《為什麼我們相信美國人》（*Why We Behave Like Americans*）³¹、《甘迺迪傳》（*John Kennedy: A Political Profile*）等美國系列（*Americana Series*），這是說明美國文化和思想的小冊子。這些書籍或是透過商業販售，或是以贈送的方式送達東南亞各地美新處（但以贈送的方式為多）。第二種是「小書計畫」（Small Book Translation Program），例如《鸚鵡螺北極海底航行記》（*Nautilus 90 North*）、《極地表面》（*Surface at the pole*）。小書計畫的概念源自於美國當時流行的口袋書、袖珍書。以及第三種「台灣報告計畫」，到了1960年，台北美新處主要出版台灣本地的作家所書寫的材料（locally written materials），這是為了鞏固海外華人對於國民黨中國的忠誠，如本文所要分析的Heritage Press系列「中翻英」的作品。

透過上述，我們分別從語言和內容定位Heritage Press系列在譯書計畫中的位置。就語言方面而言，Heritage Press系列是屬於「中翻英」的著作；就內容定位而言，則是屬於譯書計畫中的台灣報告計畫，其主要目的是面對共產中國對東南亞的文學傾銷，自由中國的美新處必須做出回應，具體說明自由中國和共產中國的差異。從Heritage Press系列的編輯和麥加錫的口述歷史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所要展現的「自由中國」是什麼？吳魯芹在*New Chinese Writing*（《新中國作品》）的序言中所說的：「這是一本台港的中國作家在

27 Operations Memorandum, USIS Taipei to USIA, "ICS: Book Translation Program", April 13, 1959, Taiwan Taipei 1959-1960, Box9, P61, RG306, NARA.

28 Operations Memorandum, USIS Taipei to USIA, "ICS: Book Translation Program", March 12, 1959, Taiwan Taipei 1959-1960, Box9, P61, RG306, NARA.

29 Operations Memorandum, USIS Taipei to USIA, "ICS: Book Translation Program", February 27, 1959, Taiwan Taipei 1959-1960, Box9, P61, RG306, NARA.

30 Operations Memorandum, USIS Taipei to USIA, "ICS: Book Translation Program", January 26, 1959, Taiwan Taipei 1959-1960, Box9, P61, RG306, NARA.

31 Operations Memorandum, USIS Taipei to USIA, "ICS: Book Translation Program", January 13, 1959, Taiwan Taipei 1959-1960, Box9, P61, RG306, NARA.

小說、詩和評論（casual pieces）的最新作品集。其目的不僅在於提供海外讀者對於中國文學現今活動不同的意見（crosscurrents），而且要給除了老作家之外的新世代作家有發表的機會。」³² 吳魯芹提到的「對中國文學不同的意見」，其針對的對象就是共產中國對於中國文學的宣傳；另一方面，吳魯芹強調「新世代」，相對於共產中國的外譯偏向古典中國文學，吳魯芹想要呈現的是新世代的中國文學，試圖與共產中國的外譯文學作出區別。

此外根據1988年12月28日，麥加錫接受美國外交研究和訓練協會的訪談逐字稿，麥加錫回憶在台北期間的作為，他說：

我在台北期間（1958年8月至1962年7月）最值得注意的：我們和年輕作家、藝術家所做的事。我們贊助（sponsored）以及和年輕作家一起從事大量的英語翻譯工作。我們出版了在台灣的中国畫家和台灣畫家的前衛（avant garde）作品。這樣做的原因之一是為了與北京大量湧出的英文翻譯作品的外文出版以及繪畫藝術競爭，並與之做出區別。這些出版物的出版是為了傳佈到世界各地，其中有一些透過商業管道，有一些透過其他地方的美國新聞處傳播。³³（底線為筆者所加）

據此口述歷史，Heritage Press系列叢書與共產中國外譯工作的對抗性昭然若揭，而不純然以「個人喜好」便能夠解釋台灣文學的外譯問題。其次，根據NARA的檔案，1959年，台灣出版商對美新處提供的建議，其中一位出版商如此說道：「文學作品也許沒有立即的宣傳價值，但是長遠來看，可能較宣傳小冊子更具有影響力，因為學生想要閱讀小說、故事和戲劇。」³⁴ 此外，根據與美新處簽約的台北記者Jason Tai的出版商調查報告“Book Publishing in Taiwan”，其中提到：一些出版商認為，美新處應該支持中國作家的原創作

32 Lucian Wu, *New Chinese Writing* (Taipei: The Heritage Press, 1962), p.iii.

33 美國外交研究和訓練協會口述歷史，（來源：<http://www.library.georgetown.edu/dept/speccoll/cl1999.htm>，2013.10.17）。

34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 USIS Taipei to USIA, "Book Publishing in Taiwan", May 28, 1959, Taiwan Taipei 1959-1960, Box9, P61, RG306, NARA.

品，即使這些作品對於私人出版商來說是無利可圖的。同時，應該將國內讀者列為譯書計畫主要的對象。因此，台灣本地作家的作品相形之下顯得重要。³⁵ 承上所述，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在「需要本地作家作品」以及「需要外譯作品」兩個需求下，台北美新處開始進行「中譯英」的計畫，Heritage Press系列叢書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三、譯書計畫中的Heritage Press叢書

關於Heritage Press系列叢書出版計畫的討論，目前所見最早的檔案日期是1960年3月4日，麥加錫參加完在菲律賓碧瑤（Baguio）舉行的協調會議，討論關於台灣報告計畫出版、印刷英文書等事宜，徵求美國新聞總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以下簡稱USIA）和香港美新處的同意。³⁶ 這段敘述提醒我們，在這個時間點，Heritage Press系列叢書還在尋求USIA和香港美新處的同意。同年11月，「台灣報告計畫」中就出現Heritage Press系列叢書的書目，所以，Heritage Press系列叢書正式開始運作的時間點應該就是1960年。「台灣報告計畫」是麥加錫所負責，這和他擔任香港美新處處長期間，從事「中國報告計畫」工作性質相似，主要是負責提供關於中國／台灣（自由中國）的最新訊息、新聞報導、重要事件、出版與翻譯書籍給其他美新處使用。台灣報告計畫的內容包羅萬象，舉凡政治、經濟、農業、科學、習俗、藝術和文學等。而其中的文學部分，就是Heritage Press系列叢書。如余光中的*New Chinese Poetry*（《中國新詩集錦》）、王德箴³⁷的*Ladies of the Tang: 22 classical Chinese stories*（《唐代名小說集》）和吳魯芹的*New Chinese stories: twelve short storie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新中國故事：當代中國的十二個短篇故

35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 USIS Taipei to USIA, "Book Publishing in Taiwan", May 28, 1959, Taiwan Taipei 1959-1960, Box9, P61, RG306, NARA.

36 Incoming Telegram, USIS Taipei to USIA, March 4, 1960, Taiwan Taipei 1959-1960, Box9, P61, RG306, NARA.

（Rainbow Press）出版。Foreign Service Despatch, USIS Hong Kong to USIA, "China Reporting Program: Summary of Activities", July 13, 1959, Box3, P61, RG306, NARA.

37 王德箴（1911-2010），江蘇蕭縣人，畢業於中央大學外文系，後留學美國，主修英國文學。1948年當選中華民國行憲以來第一屆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工作四十餘年，為典型的學者外交家。葛陵元，〈哭王德箴老人〉，《黃花崗雜誌》31期（2010.01），頁173-174。

事》)等。

Heritage Press系列叢書絕非無中生有，而是美國文化宣傳策略下具體的展現。1960年10月，台北美新處根據美國外交政策，修正1961年的國家計畫（country plan），重點是說服海外華人，自由中國才是中國社會和文化價值的守護者（the custodian of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s）、中國人民和政府真正的利益代表者，這一點和原先美方的政策差別不大，只是在字句上的修正（wording）。1961年的年度計畫，則是「聚焦在當地作家所寫作的材料，以鞏固海外華人對於自由中國的忠誠。」（Concentration during FY-1961 is on locally written material to bolster adherence of Overseas Chinese to Nationalist China.）³⁸ Heritage Press系列叢書的出版，除了前述的反共因素，還有重申對於自由中國的支持。

Heritage Press系列是美新處譯書計畫典型的運作模式。首先，以美方為主持人，再由當地的作家、翻譯家形成一個聯絡網（翻譯網），交由在地出版社——台北的Heritage Press³⁹出版，最後再由美新處購買一定的數量。此外，還必須特別留意的是，Heritage Press系列是「選集」，該叢書所選錄的作品，最初分別在不同的報章雜誌中發表，例如《文學雜誌》（*The Literary Review*）、《現代文學》（*Modern Literature*）、《聯合報》（*The United Daily News*）等。理解這一點的重要性在於，作家最初寫作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叢書的出版，而是基於各種不同的目的發表，而後這些作品再被編輯者選入選集。換句話說，編輯者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而最能體現編者的意見就是書前的序言。因此，接下來，我將觀察叢書的序言和實際的作品，可以傳達給海外華人什麼樣的書寫訊息？或是說，透過他們，海外華人可以認識怎麼樣的「中國」？

38 Unclassified, USIA to USIS Taipei, "ICS: Book Translation Program", December 27, 1960, Taiwan Taipei 1959-1960, Box9, P61, RG306, NARA

39 關於Heritage Press的創立，是由香港虹霓出版社的創辦人黎劍虹在台北所設立，黎劍虹譯為「國粹出版社」，傅建中稱之為「傳統出版社」，在本文中，為了行文方便，維持英文名。該社專門出版中國文化、文學名著的英譯，也發行畫冊（在香港印刷）推銷到美國去。梁黎劍虹，《梁寒操與我》，頁171。傅建中，〈USIA與台灣的文化發展〉，《中國時報》，1998.10.24，13版。

Heritage Press系列的主編，是後來成為中華民國筆會（The Chinese Pen）的會長，且有「民間文藝使節」之稱的殷張蘭熙。殷張蘭熙應是台灣最早有系統做台灣文學英譯的人，1961年美國新聞處資助Heritage Press出版社英譯台灣的小說和新詩，她即是*New Voice*（《新聲》）一書的主編。關於Heritage Press這套譯書的定位，可以透過殷張蘭熙的說法來理解。她說：「一九五〇年代末期，我首次注意到，當時的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幾乎呈真空狀態。已經譯成的，大多屬傳統古典作品，諸如紅樓夢、唐朝的短篇小說和唐詩等等。」⁴⁰ 殷張蘭熙的觀察是準確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文化聯絡局的報告，在歐美的中國文學翻譯，的確以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佔了多數。⁴¹ 因此，在Heritage Press系列譯書中，我們可以發現，台北美新處著重在英譯當時台灣作家的作品，亦即所謂現代文學作品，然而，「當我們宣稱『新』（new）並不意味著我們與傳統斷裂。」⁴² 相反地，這套叢書是以銜接正統中國文化自居，不僅是傳承舊文學傳統，而且也要接續新文學傳統。

例如余光中*New Chinese Poetry*一書的序言，開頭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詩歌繼承了超過兩千餘年的傳統」。⁴³ 他從中國詩歌的起源《詩經》開始談起，然後銜接到台灣戰後的現代詩，並闡述其與五四運動的關連。王德箴翻譯唐代十二篇的小說，合成*Ladies of the Tang*，原因是唐代短篇小說開啟後來宋代話本和京劇情節的雛形，雖然主要是寫唐代，但王德箴認為，唐代之前的著作已經含有小說的元素，因此她回溯到《詩經》、《春秋》。吳魯芹選譯*New Chinese Writing*，說明自由中國作家吸收外國技巧，展開實驗性的創作同時，並沒有忘卻他們自己的文學傳統，就現實的意義上來說，這些實驗性的作家是古代學者和作家的繼承者（heirs），其後吳魯芹就接著概述中國古典小說的歷史。與此相似的，聶華苓選編*Eight Stories by Chinese Women*（《中國女作家的八個故事》），在書前的序言中，首先描述在中國文學史上引人注目的女作家：

40 殷張蘭熙編，《寒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3），頁1。

41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文化聯絡局編，《中國對外文化交流概覽（1949-1991）》，頁323-324。

42 Lucian Wu, *New Chinese Writing* (Taipei: The Heritage Press, 1962), p.iii.

43 Yu Kwang-chung, *New Chinese Poetry* (Taipei: Heritage Press, 1960.12), p.iii.

漢朝的班婕妤、班昭、三國時代的蔡文姬、晉朝蘇暉的回文詩、宋代的李清照，然後接著談論冰心、凌叔華、丁玲、（黃）廬隱、陳衡哲、蘇雪林、謝冰瑩等人。從Heritage Press這套譯書編者的序言中，可以清楚地描繪出一個中國古典文學的傳統，論詩從「詩經」談起，講小說從「唐代」入手，但是，最後都一定銜接到1919年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接著才是闡述戰後在台灣發展的文學。這種文學史論述，將戰後台灣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傳統及五四新文學，緊密聯繫在一起。

Heritage Press系列叢書在書前的序言部分肯定了國民黨的五四論述，但在實際的文本中卻又似乎偏離了國民黨的五四論述。在國民黨的內部，對於五四的看法有很多分歧，有的肯定五四的科學與民主精神，有的將五四視為洪水猛獸，國民黨來台之後，開始流傳「五四亡國論」，⁴⁴甚至將白話文與共匪並列，因此，Heritage Press系列叢書此舉，是有可能觸碰到五四亡國論者的敏感神經。但整體而言，我認為Heritage Press系列的五四觀和國民黨在台灣五四論述，並不完全悖離。首先，國民黨強調五四的民主、科學、（儒家）道德與民族主義，⁴⁵其中民族主義的文學便是要讓台人熟稔中國的歷史和文學，熟悉中國的文學和歷史是為了強化台灣人對「祖國」的認同，而Heritage Press系列正好在書前的序言勾勒了中國文學的傳統，呈現其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在這個層次上，兩者的差異不大。其次，在Heritage Press系列的序言裡，五四論述僅觸及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沒有直接談論五四基本精神的爭議。但是，在實際的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作家對於中國傳統、台灣傳統的反思，這一點又與國民黨擁護中國文化傳統的五四論述不盡相同。換句話說，這套叢書的文本為我們展現一種不同於國民黨官方的五四論述，而可以被視為

44 呂正惠，〈中國新文學傳統與現代台灣文學〉，《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5.07），頁188-190。

45 關於國民黨的五四論述，可以參考下面的文章。許壽裳，〈台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發表於《新生報》1947.05.04，轉引自黃英哲編，《許壽裳台灣時代文集》，頁237-239。趙友培，〈五四的新評論〉，《文藝創作》1期（1951.05），頁137-147。虞君質，〈五四以來中國文藝思潮之批判〉，《文藝創作》37期（1954.05），頁88-99。陳紀滢，〈泛論五四及新文藝運動〉，《文藝創作》49期（1955.05），頁1-5。

是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五四觀。

除了中國新舊文學的傳統之外，在Heritage Press系列中，讀者也會發現其所展現出來典型的中國文化、生活、習俗和情感。另外，也展現有別於中國文化的台灣元素，因為美新處的台灣文學外譯，希望真切地呈現台灣文學、文化與生活的各個面向（stories about ordinary facets of Taiwanese Life）。根據麥加錫為陳若曦的*Spirit calling : five stories of Taiwan*一書所寫的序言：「作為一位觀察者，我認為陳若曦小說最成功的，是她不具有企圖心卻關於台灣日常生活各個面向的作品，例如：〈招魂〉和〈招弟的早晨〉。」⁴⁶在Heritage Press系列中，可以看到許多作品深刻地描繪出台灣的傳統習俗、日常生活等，例如在小說中穿插颱風、米粉、彰化貓鼠麵（Cat and Mouse Noodles）等。而且，這群知識分子大多站在反思的角度去看待台灣傳統，如果是女性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到他們抗拒、反思加在他們身上的傳統，正如五四運動對於封建傳統的反省。

例如陳若曦所寫的幾篇英文小說：“A Morning for Chao-ti”（〈招弟的早晨〉），直接收錄在Heritage Press選集中。書寫台灣有重男輕女的社會現象，在此現象下，作為長女的招弟如何不被重視卻又背負家庭的責任，除了幫助家中食堂的經營，還要照顧年幼的弟弟和不良於行的母親。文中可以看到台灣留有日本統治的生活遺跡，如食堂提供日本生魚片（Sashimi）、擺設磨損的日本漆器。另一篇同是英文創作的小說是“Miner’s Wife”（〈礦工之妻〉），描述和反省在傳統中國「同姓不婚」的傳統習俗。這兩篇小說在既有的陳若曦研究中常被忽略，但這是陳若曦早期以英文創作的小說作品，反映她對傳統習俗、性別角色的思考。

此外，陳若曦的作品有些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收入選集，例如“Spirit Calling”（〈招魂〉），寫台灣傳統的道士招魂儀式，作家以知識分子的角度看待這種「迷信」的傳統習俗，雖然帶著懷疑和批判，但是，作家透過這

46 Richard M. McCarthy所寫的序言，收錄在Lucy H. Chen, *Spirit Calling: Tales About Taiwan* (Taipei: The Heritage Press, 1962), p.vii.

個批判的過程，卻又凸顯出一家人為弟弟祈福的複雜心情。“Ah-Chuang of Heaven-Blesses Village”（〈辛莊〉）中置換傳統婚姻關係中男強女弱的性別角色，寫男主角辛莊的妻子雲英的外遇，而他卻軟弱無奈的故事。陳若曦透過角色置換，顛覆傳統對於女性的定見，寫出勇於追求的女性。此外，文中描述當時台灣婦女流行去看歌仔戲，反映台灣早期的社會景象。上述兩篇小說，分別是從《現代文學》第三期、第五期中選錄出來，由陳若曦翻譯後，放入 Heritage Press 的 *Spirit calling: five stories of Taiwan* 中。

還有黃娟的“A Marriage Has Been Arranged”（〈相親〉）一篇，描述 1950 年代的台灣婚姻問題，從媒妁之言的老式婚姻如何走向自由戀愛，以及女主角秀宜在傳統相親和戀愛、婚姻自由之間的掙扎。⁴⁷ 凡此種種，顯示新世代的知識份子對舊有的傳統既不能完全接受，卻也未能完全掙脫，而該系列叢書就是對於台灣邁向現代化，新生代知識分子的內心掙扎的紀錄。正如美新處處長麥加錫為陳若曦所作的序，序文所言：「戰後台灣隨著工廠林立、都市興起，現代化的事物進入台灣農村之際，作家扮演記錄這段過程的角色，但我認為他們不僅是單純的觀察者，他們帶有深刻的反省與批判」。⁴⁸

在部分篇章也記錄了中國邁向現代化，處於新舊交替之際的知識分子如何反思。例如林海音的“Candle”（〈燭〉）描寫民國初期，「正室」無法容忍丈夫娶姨太太的故事，反映在五四新舊交替之際，女性雖然想要抗拒傳統所造成的宿命，卻對自己的婚姻無法完全的自主。如果說，這篇作品是知識份子對於身處的中國傳統和社會環境的反思，那麼，有些作品看到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小人物的不得志。例如潘人木的“The Last Race”（〈寧為瓦碎〉），透過一個八歲小女孩的眼睛，敘說火車這個現代文明的怪獸，如何改變中國北方鄉村的馬車伕這個行業，有一些小人物註定在現代化的過程被犧牲。而潘人木描述的是馬車伕鄭大海最後和火車競速比賽的掙扎，最後馬車伕的生命在現代化的輾壓中結束。在這裡，我看到知識分子面對新舊交替的另一種姿

47 Nieh Hua-Ling, *Eight Stories by Chinese Women*. (Taipei: The Heritage Press, 1962), pp.3-21.

48 Richard M. McCarthy 所寫的序言，收錄在 Lucy H. Chen, *Spirit Calling: Tales About Taiwan* (Taipei: The Heritage Press, 1962), pp.vii-viii.

態，除了前一段所展示的批判之外，還有對卑微小人物無限的同情和憐憫。因此，透過Heritage Press系列，美新處和編者們試圖呈現的是一個「現代中國」（Modern China）⁴⁹，既傳承中國舊傳統，但不囿於傳統，增加台灣的文化元素，在傳統中求現代、進步、求新，因此，這套叢書的書名，以「新」（New）作為命名。

「新」的第二層意義是「新生代」作家，也就是所謂的戰後第二代。新生代作家在文本題材的選擇上，除了描繪台灣或過去中國的現實，他們還挑戰了很多新的情感和禁忌，這也是現代主義小說在題材上的勇於創新。例如：王文興在*New Voices*（《新聲》）中的“Wedding of a White-Collar Worker”（〈一個公務人員的結婚〉），挑戰了當時對於男女未婚同居、未婚懷孕的禁忌，並去反省「夫妻」和「同居男女」的差別是什麼？我認為這是作家有意識地思考婚姻制度和所謂道德傳統的意義。歐陽子收在*Eight Stories by Chinese Women*的“Wall”（〈牆〉）一文，處理妹妹和姊夫之間曖昧的關係。同一書中，侯真生的“Fireside Chat”（〈爐邊夜語〉）處理婚外情的議題。在王禎和被選錄在*New Voices*中的“The Ghost and the North Wind”（〈鬼、北風、人〉），這篇短篇小說被視為是他的「出世」之作，不論就內容或是手法都是創新的，在內容上挑戰親姐弟之間的曖昧情愫，在技巧上，王禎和擅長寫景和人物的細節，還運用內心獨白的心理分析，讓男主角貴福在回憶中獨白，藉此說明對某些人來說，人生註定是失敗的，為了生存，人可以變得很自私。鍾肇政“Feet”（〈腳的故事〉）、潘人木“The Last Race”、陳若曦“A Morning for Chao-ti”等篇章，同樣運用意識流的寫法，打破過往小說書寫的時間順序，透過文中人物的回憶、意識的流動，來回想一生的經歷或是創傷。意識流在Heritage Press系列中是最為常見的手法，並且形成一個非常類似的寫作模式——藉由「現在、過去、現在」的鏡框式寫法，透過中間的回憶讓主角的意識奔馳，回到過去的某個場景和經驗。

49 殷張蘭熙在*Green Seaweed and Salted Eggs*（中文名《綠藻與鹹蛋》）的譯序中提及，將中國文學的書籍譯成英文，是要讓外國讀者知道「現代中國」（Modern China）的狀況。Ing Chang Nancy, *Green Seaweed and Salted Eggs*（Taipei: The Heritage Press, 1963.10）, p.3.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作家在小說中使用這些實驗性的手法，他們的重點絕非在此，不是純粹的追求技巧而已。而是如吳魯芹所說的，他們學習20世紀初期歐洲作家的敘事策略（*narrative devices*）和角色探索（*character probings*）⁵⁰，但是，他們真正的重點是藉由學習西方的過程，敘說自己周遭的過去或是現在的故事。我認為，吳魯芹真正的用意在於，這些作家身上顯現的是「進步的中國性」，透過新的技巧，其實要說明自由中國作家不斷追求進步和創新。只是後來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等人，被視為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代表，其實，他們在書寫的內容上還是現實主義的。

最後，追求進步的中國性，其背後潛藏與共產中國競爭的邏輯。這套叢書是為了給海外的華人或英文世界的讀者看的，因此，還必須強化自由中國的反共立場，形成一種二元對立的敵我意識：亦即自由中國的文壇思想自由、寫作自由，而共產中國則相反。這種反共的立場隱微地出現在叢書的序言中，也展現出若干的文本裡。例如余光中在*New Chinese Poetry*的序言中提到，大部分的老詩人仍在中國大陸，他們已經耗盡了創造力，或者在共產中國的統治下噤若寒蟬。⁵¹ 聶華苓在*Eight Stories by Chinese Women*則提到，進入新文學時期，文學革命喚醒對於大眾以及對於人性尊嚴的關注，女性開始為過往加諸在她們身上的限制發出聲音，女性作家開始寫作小說，並受到熱烈的關注。聶華苓還特別提及丁玲的處境，這和序言通常介紹女作家的作品風格很不同，她描述丁玲1931年加入共產黨，後來被清算（*purge*），最後在北平的大廈中當清潔工人服勞改，⁵² 這裡頗有政治性的暗示，亦即在共產中國下作家不幸的遭遇。吳魯芹在*New Chinese Stories*序言中寫道：「沒有任何單一思想派別或是文學理論可以主宰中國小說，除了中國大陸，小說必須召喚過去的罪孽，或是勞動大眾的榮光。」⁵³ 透過陳述共產中國在思想和寫作上對於作家的箝制，吳魯芹說明該書內容的光譜廣泛，從想像冒險到家庭喜劇，從諷刺文學到多愁善感的愛情

50 Wu Lucian, *New Chinese Writing*, p.iii.

51 Yu Kwang-chung, *New Chinese Poetry*, p.vii.

52 Nieh Hua-Ling, *Eight Stories by Chinese Women*, p.vii-viii.

53 Wu Lucian, *New Chinese Writings*, p.iv.

故事都有。換句話說，自由中國不會僅有一家之言，作家們可以盡情地展現個人風格，甚至其中有些篇章是「實驗性」（experimental）的作品，作家以能尋找新方向自豪。吳魯芹的這段話突顯自由中國的文藝自由，而這樣的自由是與共產中國相對的存在。

反共意識展現在叢書的文本裡，可以彭歌的“Black Tears”（〈黑色的淚〉）為代表，這篇得到《亞洲畫報》徵文比賽普通組優秀獎的小說。該篇故事的主角虎子（或稱虎頭、虎少爺，且剛好作者彭歌也屬虎），是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母親早逝，與親生父親疏離，更加深他的童年、青少年的寂寞，而故事中的煤球工人黑拐李就是他在鄰居、同儕之間尋求的友誼。我認為這部小說的前半部真實而動人，這與作者的童年經驗（例如：失去母親）且在中國北方生活的經歷有關，尤其第四小節針對如何製作煤球取暖的過程，作者描繪得相當仔細。整體來看，我認為這篇小說在描寫人物的心理感受上很深刻。然而，這篇故事在其後半部分筆鋒一轉提到九一八事變，也提到共產黨，作者寫道：「人人多說老八比老日更不成話。」（按：老八即是中共的八路軍，老日即是日本人），後來黑拐李受到中共的清算、鬥爭而變了個人。寫到最後，點出反共的意識形態。我認為，在提到共產黨之前，彭歌是在寫自己的生命故事，真摯而動人，尤其是在人物的內心書寫部分，這些必須要給予肯定。雖然他最後仍然落於反共窠臼，但這並不完全抵消前文的寫作技巧與文學價值。整體而言，Heritage Press叢書的「反共」元素相較於上述的「反傳統」顯得相對稀薄，而且潛藏地更為幽微。

總結上述，如果以描述性的概念來概括，我們可以說，Heritage Press系列展現了一種中國性（而且是現代中國性）、現代性（現代主義文學的題材和技巧）和反共性的集合體。然而，透過麥加錫和編者們的序言，我認為他們最為強調的還有「人性」（Human Nature），編者們期待看到的是平凡生活中的「人」，以及人在其所處的境遇中如何掙扎。這一點強烈地表現在麥加錫、殷張蘭熙等人所寫的序言，其實也明顯地表現在作家的作品中。我們或許無須懷疑作家們寫作時的真誠，然而，我們不能僅將編輯者對於「人性的強調」，視為一種對於文學普遍價值的追求而已，而必須放回1950年代反共

文藝體制的背景下考慮。「人性／反人性」就是自由中國與共產中國在論述上的具體差異，對於共產中國而言，「『人性論』是資產階級企圖解除無產階級鬥爭意志的慣用武器，是一切修正主義共同的东西，它是資產階級文藝理論的核心。」⁵⁴相對於此，自由中國的文藝論述強調「人性」，因為對他們而言，「五四精神一般的標誌是『民主』與『科學』。但如果更進深一層從本質上去判析，我們也許可以提出『人性』和『理性』這二個範疇來概括它。事實上，人性正是民主的內蘊，理性更屬科學的基礎；民主與科學，即是人性與理性的外現罷了。」⁵⁵從這點來看，強調「人性」不僅是「反共」的，而且它來自五四精神的遺緒。易言之，強調個人、人性（論），和國民黨《文藝創作》上的反共文藝論述並不違背，而強調「人性」也正與共產中國的「階級」概念相對立，共產中國的文學強調階級性。或許我們可以說，Heritage Press系列的作家、編輯者的想法，和當時主流的、國家的文學觀點並不扞格，反而是安全地保持了一致。

最後，Heritage Press系列譯書除了建構對中國新舊文學傳統的接續，強調反共和現代文學之外，我認為，這套書籍還展現出兩個特色：首先，這套叢書所選擇的作者，反映當時台灣文學社群的集結，亦即以美新處的文藝聚會和春臺小集為中心的作家群。麥加錫處長常在其官邸舉行文藝派對，邀請本地文藝工作者和美國官方人員用餐，譬如：鍾肇政、聶華苓、陳若曦、畫家席德進，而且透過麥加錫，《現代文學》的作家們得以認識張愛玲。⁵⁶此外，彭歌在〈春臺那幾位「文藝青年」〉一文中提到，「春臺」是一群年輕的知識分子的小小聚會，大家都很誠懇地熱愛文學、熱愛人生，通常是每月一聚，彭歌、司馬桑敦、郭嗣汾、周棄子、潘琦君、李唐基、何凡、林海音、聶華苓、郭衣洞（柏楊）是原始會員，後來夏道平、高陽（許晏駢）、南郭（林適存）加入，不久之後又有吳魯芹、夏濟安、劉守宜、孟瑤（揚宗珍）、公孫嬾（查

54 易金，〈人性的修正主義與文學創作〉，《聯合報》，1959.02.24，2版。

55 社論，〈讓「人性」和「理性」照亮我們〉，《聯合報》，1959.05.04，2版。

56 陳若曦，《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台北：九歌出版社，2011.10.），頁96-100。在該書中，陳若曦也提到和殷張蘭熙結識的過程，主要是因為殷張蘭熙在台大對面新生南路上的基督教真理堂，開辦了英美現代詩欣賞班，南北社的王文興、洪智慧（歐陽子）等人也參與其中。

顯琳）、王敬羲等。⁵⁷ 其中，彭歌、司馬桑敦、林海音、聶華苓、南郭（林適存）、吳魯芹、孟瑤（揚宗珍）等人的作品都選入Heritage Press系列。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品有一個微妙的「巧合」，就是放在小說選集的第一篇作品都是本省籍作家的作品，例如：*New Voices*的第一篇是陳若曦的“Spirit Calling”，*New Chinese Stories*的第一篇是鍾肇政（客籍作家）

“Feet”，*Eight Stories by Chinese Women*的第一篇是黃娟（客籍作家）“A Marriage Has Been Arranged”，這是純粹的巧合還是特意的安排？這可能涉及的問題是，「省籍」因素是否作用在戰後第二代的作家身上？

根據1961年台北美新所做的調查報告（Inspection Report），提到當時82%的本省人對外省人佔據90%的政府職位「深深地仇視」（resent deeply）。⁵⁸ 當時的美國大使莊萊德（Everett F Drumright）認為有必要和美新處合作解決這個問題，他說：

在台灣真正的問題是，台灣人和大陸人之間潛在的劃分，如果不以極大的關懷和智慧處理，這種區分可能極有可能被利用。我認為這是我們的任務之一，不是強調這種潛在的區分，而是試著彌合兩者之間的鴻溝。這需要時間、耐心和微妙的、智慧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正是本著這種精神，大使館和美新處試圖處理這個問題。⁵⁹

從這段美國大使莊萊德的報告，可看到美方意識到當時台灣社會真正的問題是省籍的潛在劃分，而他們想要扮演的是彌補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鴻溝的角色。或許這可以為Heritage Press系列作品的第一篇為何都是本省籍作家提供部分解釋，就是試圖透過新生代作家的書寫，在其中展現本省、外省作家都出現在

57 彭歌，《憶春臺舊友》（台北：九歌出版社，2009.12），頁10-15。

58 Inspection Report, USIS Taipei to USIA, October 20, 1961, A-8 Organization & Administration INSPECTION REPORT 1961,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wan: U.S. Embassy, Taipei: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Classified Alpha-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RG84, NARA.

59 Inspection Report USIS/ Taiwan, 1961/10/20,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Service Posts, Taiwan, U.S. Embassy, Taipei: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RG84, NARA.

同一部選集中，說明Heritage Press系列沒有忽略台灣本省作家，甚至想要突顯本省作家，這或許就是美新處在文化上的一種彌合的作為。

另一個證據來自1960年8月10日，吳魯芹對於本省籍作家所做的調查報告，其英文的標題是“Native-Born Taiwanese Writers”。吳魯芹之所以會寫這份報告背後的原因是為了編纂Heritage Press系列的短篇小說作品集，而他需要一至二篇本省籍作家的作品，這正好呼應當時美國大使館、美國新聞處的理念。誠如上述，美國大使館、美新處這兩個單位試圖填補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鴻溝。針對吳魯芹的這份報告，麥加錫在回報給USIA的時候提到：

附件是關於在台灣出生的中文小說作家的報告，由美新處本地雇員吳魯芹所擬定。該報告源自許多努力的成果：為了尋找一到兩篇土生土長的作家所寫的短篇小說，並將其收錄在美新處出版與翻譯的中文短篇小說集裡頭（這個工作是台灣報告計畫的一部分）。⁶⁰

根據麥加錫的報告，吳魯芹在編纂Heritage Press系列時，是很有意識地要納入台灣出生的本省籍作家，透過吳魯芹的本省籍作家報告，他提到林海音為本省籍作家提供發表的園地，在當時的台灣文壇極具影響力；鍾理和雖然不是多產作家，但是他在「描繪這個不可愛的世界的某些面向」（to depict certain aspects of this unlovely and unlovable world），而且做的很好。其他還有施翠峰、廖清秀、許炳成（文心）、鍾肇政、陳火泉、林文月等。在這些本省籍作家的評述中，吳魯芹對鍾理和的描述和介紹篇幅最多，給予的評價也相當高。不過，吳魯芹最後選擇的卻是鍾肇政的作品“Feet”，本文認為，這可能與“Feet”這篇小說所採用實驗性的意識流寫法有關，是與吳魯芹編纂的選集其他文章是保持一致的風格，就是選擇實驗性、現代主義（意識流）寫法的小說。

Heritage Press系列所展現的第二個特色，便是叢書中的*New Voices*可以說

60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 USIS Taipei to USIA, “Report on Native-Born Taiwanese Writers”, August 15, 1960,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wan: U.S. Embassy, Taipei: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Classified Alpha-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Box3, RG84, NARA.

是台大、師大學生的「作品集」，主要以詩和小說為主；*New Chinese Writings*的內容更為豐富，也是一種實驗性的作品集結，包括文學和繪畫，而以台港作家（其中仍是以台大學生為主體）的詩、小說、評論（essays）⁶¹和席德進的畫作為主。讓「新生代」作家發出「新聲」的合輯作品，這樣的集結形式在美新處的譯書計畫中顯得獨特。因為在譯書計畫中，我們可以看到教師單獨出書，例如殷海光（哲學領域），或是教師自己出版作品集，例如Dr. Thomas J. Ho出版*The Free and Democratic Economic System*，該書收錄對政治大學學生的四篇演講稿。⁶² *New Voices*、*New Chinese Writings*這種實驗性的學生作品集，還是目前譯書計畫中所見的特例。

為什麼美方會願意出版這些學生初試啼聲之作？這其實和美方最終的目的是「反共」而非「文學」有關。甚至部分選集連麥加錫都不甚滿意。比如說余光中*New Chinese Poetry*。麥加錫向USIA說明余光中*New Chinese Poetry*出版的經過時提到：

這些詩中沒有一首接近所謂偉大的詩歌。然而，我們希望透過這部作品可以展現給其他國家對文學有興趣的人們；台灣詩人——不像他們那些在中國大陸上只會模仿的同行們——是憑藉著他們自主的、具有個性的主題和技巧，自由地創作。⁶³

本身主修美國文學的麥加錫，對於余光中*New Chinese Poetry*顯然評價不高，然而，對美新處來說，作品的好壞不是問題，亦即美新處出版余光中所編選的詩集並非基於文學鑑賞，重點在於呈現自由中國的詩人們可以「自由書寫」，而這和共產中國是大相逕庭的。整體而言，這也是Heritage Press系列在對外宣

61 在*New Chinese Writings*的casual pieces，也就是評論「essays」，比較接近今天的「短評」，作者針對社會的某一現象，提出自身的看法。

62 Operations Memorandum, USIS Taipei to USIA, "ICS: Book Translation Program—Indigenous Author", May 24, 1960, Taiwan Taipei 1959-1960, Box9, P61, RG306, NARA.

63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 USIS Taipei to USIA, "Locally Written Book in English Translation: New Chinese Poetry", January 18, 1961,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wan: U.S. Embassy, Taipei: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Classified Alpha-Numeric Subject Files, 1957-1961, Box3, RG84, NARA.

傳上的目的，凡此種種，可以突顯Heritage Press系列譯書在美新處的譯書計畫的特色。透過Heritage Press系列，反共性成了Heritage Press的隱蔽文本，而現代性（現代主義）、進步的中國性和人性才是世人所見的公開言行。

四、結論

本文從美新處的譯書計畫來重新審視台灣文學的外譯史，認為應該將既有論述的時間點提前至1950年代，也說明美新處的Heritage Press系列象徵戰後台灣文學有計劃、有系統地外譯的開始，使戰後新生代作家的作品透過譯書計畫登上國際舞台。相較於1950年代國民黨的外譯計畫，美新處的譯書計畫顯然多了文學味。在新詩方面，余光中的*New Chinese Poetry*，是戰後自由中國新詩外譯的開始，在這本書的序言裡，余光中重申三大詩社（schools）的概念，即現代派（Modernists）、藍星（Blue Stars）和創世紀（Genesis Group）⁶⁴。在小說方面，多篇小說更是作家的出世之作，例如白先勇的“The Elder Mrs. King”（〈金大奶奶〉）⁶⁵、王禎和的“The Ghost and the North Wind”（〈鬼、北風、人〉）⁶⁶等；其中有些作家的作品後來為台灣文壇所淡忘，例如鍾肇政的“Feet”、陳若曦的“A Morning for Chao-ti”；更有些學生作家後來為台灣文壇所遺忘，例如秀陶、林枕客、侯真生。但透過重新整理美新處的譯書計畫，讓這些台灣作家所寫的英文小說、詩、散文和評論，重新回到台灣文學史的扉頁。此外，透過該叢書的分析，我們在實際的作品中看到中國性（台灣性）、反共性、現代性和人性這四個概念，如何在文本中展現，而這四個概念也呼應戰後美國和自由中國的政治目標。

其次，透過美新處譯書計畫的分析，我們重新審視和台灣文學發展關係最

64 Yu Kwang-chung, *New Chinese Poetry* (Taipei: Heritage Press, 1960.12), p.vii-xi. 根據蔡明諺的研究，「三大詩社」目前可見最早的記載應是1959年4月，余光中在回答美國詩人佛洛斯特問題時，首先提出三大詩社的說法。蔡明諺，〈一九五〇年代台灣現代詩的淵源與走向〉（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頁322。

65 白先勇的第一篇小說〈金大奶奶〉發表在1958年9月號的《文學雜誌》上，那時他才剛唸完大學一年級。夏志清，〈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說——代序〉，白先勇著，《寂寞的十七歲》（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76）。

66 王禎和的第一篇小說〈鬼、北風、人〉發表在1961年3月第7期的《現代文學》上，這篇小說被視為王禎和文學生涯的起點。

密切的美新處處長麥加錫，修正和調整既有對於麥加錫的看法，並非「個人」而是「個人和體制」共同促成戰後台灣文學的外譯。在其中，我們看到從美國的外交政策、台北美新處的國家計畫、譯書計畫，這是美方的文化宣傳政策，如何透過與在地文學社群、在地出版社（Heritage Press）的合作。一方面美方可以落實冷戰文化宣傳的目標，另一方面，也讓本地作家獲得發表的園地、發聲的機會，讓台灣當地的出版業可以發展。透過美新處譯書計畫的催化，讓美新處與在地出版社、本地作家合作，譜成戰後台灣文學外譯的樂章。

然而，在欣賞這些動人的作品之餘，不能忘記的是，這些看似感人的作品，除了是作家嘔心瀝血的作品，同時也被拿來作為美新處溫柔的冷戰武器。它們的目的不在於殺戮，非但不會讓人刀刀濺血，有時反而令人感覺讀來字字血淚。因為這些作品最終的目的不在於傷害人，而在於擄獲人心。



參考資料

一、專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文化聯絡局編，《中國對外文化交流概覽（1949-1991）》（中國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2）。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76）。

呂正惠，〈中國新文學傳統與現代台灣文學〉，《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5.07）。

辛廣偉，《台灣出版史》（中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08）。

殷張蘭熙編，《寒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3）。

陳若曦，《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台北：九歌出版社，2011.10.）。

彭歌，《憶春臺舊友》（台北：九歌出版社，2009.12）。

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03）。

梁黎劍虹，《梁寒操與我》（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0.08）。

黃英哲編，《許壽裳台灣時代文集》（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11）。

Chen H. M. Lucy, *Spirit calling : five stories of Taiwan* (Taipei: The Heritage Press, 1962)

Ing Chang Nancy, *New Voices: stories and poems by Young Chinese writers* (Taipei: The Heritage Press, 1961)

Lin Hai Yin, Translated by Nancy Chang Ing, *Green seaweed & salted eggs* (Taipei: The Heritage Press, 1963)

Nieh Hua-Ling, *Eight Stories by Chinese Women* (Taipei: The Heritage Press, 1962)

Wu Lucian, *New Chinese Writings* (Taipei: The Heritage Press, 1962)

Yu Kwang-chung, *New Chinese Poetry* (Taipei: The Heritage Press, 1960)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王禎和，〈鬼、北風、人〉，《現代文學》7期（1961.03），頁88-106。
- 陳紀滢，〈泛論五四及新文藝運動〉，《文藝創作》49期（1955.05），頁1-5。
- 單德興，〈齊邦媛教授訪談：翻譯面面觀〉，《翻譯論叢》5卷1期（2012.03），頁247-272。
- 彭瑞金，〈台灣文學亟需台灣觀點的外譯計畫〉，《文訊》274期（2008.08），頁48-51。
- 葛陵元，〈哭王德箴老人〉，《黃花崗雜誌》31期（2010.01），頁173-174。
- 虞君質，〈五四以來中國文藝思潮之批判〉，《文藝創作》37期（1954.05），頁88-99。
- 趙友培，〈五四的新評論〉，《文藝創作》1期（1951.05），頁137-147。
-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1951-1970）〉，《歐美研究》31卷1期（2001.03），頁79-127。
- 齊邦媛，〈中書外譯的回顧與檢討〉，《文訊別冊》151期（1998.05），頁22-24。
- ，〈台灣文學作品的外譯〉，《精湛》28期（1996.05），頁38-40。
- 譚光磊，〈台灣文學外譯與大眾出版〉，《台灣文學館通訊》32期（2011.09），頁37-43。

（二）學位論文

- 李惠珍，〈美國小說在台灣的翻譯史（1949-1979）〉（台北：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 周文萍，〈美國戲劇在台灣（1949-1994）〉（台北：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 林果顯，〈一九五〇年代反攻大陸宣傳體制的形成〉（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 蔡明諺，〈一九五〇年代台灣現代詩的淵源與走向〉（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
- 賴慈芸，〈飄洋過海的謬思：美國詩作在台灣的翻譯史（1945-1992）〉（台北：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三、報紙文獻

禾辛，〈「紅樓夢」英譯本〉，《聯合報》，1958.06.04，6版。

何凡，〈文藝也該輸出（下）〉，《聯合報》，1970.04.07，9版。

易金，〈人性的修正主義與文學創作〉，《聯合報》，1959.02.24，2版。

社論，〈讓「人性」和「理性」照亮我們〉，《聯合報》，1959.05.04，2版。

陳紀滢，〈「荻村傳」英、日文版出版經過〉，《聯合報》，1974.11.18，12版。

傅建中，〈USIA與台灣的文化發展〉，《中國時報》，1998.10.24，13版。

四、電子媒體

美國外交研究和訓練協會口述歷史，（來源：<http://www.library.georgetown.edu/dept/speccoll/cl999.htm>，2013.10.17）。

五、其他

美國國家檔案局檔案（簡稱NARA）。

齊邦媛主講，《我對台灣文學與台灣文學研究的看法》DVD（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09）。

